

# 美国对华大豆贸易的双层博弈分析

■ 徐振伟 吴亦泽 南开大学

**摘要:**大豆是全球大宗交易商品,关税税率的调整和出口许可调整对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成本和规模均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全球大豆乃至油料油脂市场供需形势和价格走势,相应的全球大豆贸易风险和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中美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大豆进口国和生产国,近年来围绕大豆的贸易纷争不断。对美国而言,美国既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又面临来自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博弈。这种双层博弈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认清美国对外大豆贸易的实质,从而有助于中国制定自身的政策。

**关键词:**大豆贸易;双层博弈;要素博弈;利益博弈

美国2018年3月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引发了人们对大豆贸易的关注。针对中美大豆贸易,姚林(2020)从定价权的视角梳理了在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大豆产业发展状况,认为经济收益较低是国产大豆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同时贸易摩擦会重塑全球大豆贸易格局;肖志敏、杨军(2019)通过运用GTAP模型来估算中美大豆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其研究发现大豆贸易战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国内大豆上游产业链的发展,但对大豆下游产业链的发展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榨油行业和畜牧业;侯荣娜、戴旭宏(2019)着眼于中美贸易战与中国东北大豆生产之间的联系,认为贸易摩擦对中国东北的大豆产业带来了冲击,但也提供了机遇,并从多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张莹(2019)指出中国对大豆的需求呈刚性增长且缺乏弹性,在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不得不寻求大豆进口来源的多元化,该论文采用GTAP模型模拟对中国、巴西、阿根廷、美国产生的具体影响,强调中国应加强同南美国家的农业合作,强化对进口替代大豆的质量监控;崔戈(2019)从粮食安全战略的高度剖析了大豆背后的中美博弈和政治因素,指出了中国大豆贸易定价权旁落的原因以及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的风险,强调了粮食外交的

重要性以及美国对大豆贸易的隐形控制。

本文借助双层博弈的分析框架,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因为对美国而言,美国贸易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其核心是平衡国内和国际的利益考虑。具体来说,贸易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到国家安全、国际经济关系的稳定、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因此,美国的贸易政策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政治属性;不仅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特别是在对华大豆贸易问题上,美国政府需要实现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均衡,因此在分析美国对华大豆贸易的问题上应该采取国内和国际要素统一的双层博弈理论。

## 一、中美大豆贸易国际层面的博弈分析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错综复杂,中美之间贸易政策的互动也是在权衡了各方利益、充分博弈之后作出的抉择。在这里我们主要考虑涉及大豆贸易的政治、社区和农业因素,稍带一些工业和其它产业。

中美之间的贸易具有不对称性,即美国对中国制造业产品依赖较高,而中国对美国农产品依赖较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与RCEP成员国国门安全风险的跨境协同防控与韧性治理研究”(22BGJ012)。

[作者简介]徐振伟(1979—),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非传统安全。吴亦泽(2000—),男,南开大学金融学院研究助理;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高。美国为了扭转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而选择了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也相应地增加了美国大豆的关税。中美双方在大豆贸易问题上的政策都体现了各自在政治和经济、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利弊分析。

(一)中美大豆贸易的要素博弈分析

中美之间的大豆贸易符合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该理论认为，即使两个国家生产同样的两种产品，只要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那么国际贸易仍有可能发生，并且贸易双方均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中美大豆贸易正是遵循了比较优势原理，使得两国的福利水平均能从贸易中得到改善。

美国在大豆生产和贸易中具有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在自然资源禀赋上，美国的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居世界前列，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其二，在科技扶持方面，美国的农业科技投入规模巨大，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出油率水平高，且该优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被逆转。其三，在资金投入方面，农业是弱质的产业，农业产量很容易受天气情况、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保护。而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农业的保护，给予农业巨额补贴。上述因素决定了美国在大豆生产方面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园艺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近年来，中国大豆消费量不断增加，这促使中国对美国大豆需求量的进一步增加，成为中美开展大豆贸易的重要条件。尽管两国不同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决定了两国对对方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是在大豆产品层面，中国对美国产品的依赖性要强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性，也正是这种不对称决定了中美贸易中中国处于劣势。

(二)中美大豆贸易的国家利益博弈分析

中美之间的贸易具有不对称性，即美国对中国制造业产品依赖较高，而中国对美国农产品依赖较高。美国为了扭转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而选择了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也相应地增加了美国大豆的关税。如下图所示，中美双方在大豆贸易问题上的政策都体现了各自在政治和经济、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利弊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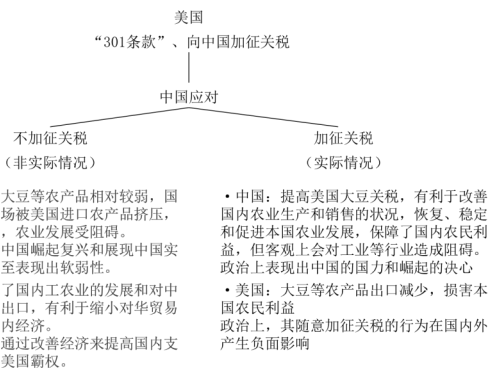


图1 中美两国在大豆贸易问题上的利弊分析

本文采用相关的分析框架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设国家  $G_1$  和  $G_2$  分别代表中国和美国， $P_1$  和  $P_2$  分别代表中国国内市场和美国国内市场的大豆价格， $Q_1$  和  $Q_2$  分别代表中国和美国大豆生产者的大豆供给， $C_1$  和  $C_2$  分别代表中国和美国的大豆生产成本。假设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行为，中国政府将通过制定配额(用  $Q$  表示)来限制从美国进口大豆。简便起见，在存在配额的情况下，中国和美国国内市场需求曲线被分别假设如下，其中  $b$  及  $b'$  分别为中美两国市场中大豆需求侧的价格弹性，表示价格每变动一个单位，需求变动的幅度：

$$P_1 = A_1 - b(Q_1 + Q) \tag{1}$$

$$P_2 = A_2 - b'(Q_2 - Q) \tag{2}$$

式中  $A_1$  和  $A_2$  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消费者对大豆的最高保留价格，其中  $A_1 \geq C_1$ ， $A_2 \geq C_2$ 。如果  $A_1 < C_1$ ， $A_2 < C_2$ ，则大豆生产者没有动机生产大豆。同时，鉴于美国农业在高度机械化条件下的生产效率更高，因而大豆的单位生产成本相对较低，故假设  $C_1 > C_2$ ，即中国大豆的生产成本高于美国大豆。

根据博弈论中“逆向归纳法”的分析思路，首先分析配额对中美两国大豆生产者的生产决策的影响。中国和美国大豆生产者的利润表达式分别为：

$$\pi_1 = (P_1 - C_1)Q_1 \tag{3}$$

$$\pi_2 = (P_2 - C_2)(Q_2 - Q) + (P_1 - C_2)Q \tag{4}$$

将(1)式代入(3)式，可得

$$\pi_1 = -bQ_1^2 + (A_1 - C_1 - bQ)Q_1 \tag{5}$$

中国的大豆生产者能够决定大豆的产量  $Q_1$ ，根据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可得

$$\frac{\partial \pi_1}{\partial Q_1} = -2bQ_1 + (A_1 - C_1 - bQ) = 0$$

进而求出中国大豆生产者的最优产量和最优利润分别为

$$Q_1^* = \frac{(A_1 - C_1 - bQ)}{2b} \quad (6)$$

$$\pi_1^* = \frac{(A_1 - C_1 - bQ)^2}{4b} \quad (7)$$

同理,可得美国大豆生产者的最优产量为

$$Q_2^* = \frac{(A_2 - C_2 + 2b'Q)}{2b'} \quad (8)$$

$$\pi_2^* = \frac{(A_2 - C_2)^2}{4b'} + (2b' - b)Q^2 + (A_1 - C_2 - bQ_1)Q \quad (9)$$

将(6)式代入(9)式,整理出 $\pi_2^*$ 关于 $Q$ 的表达式为

$$\pi_2^* = \frac{(A_2 - C_2)^2}{4} + \frac{(4b' - b)Q^2}{2} + \frac{(A_1 - 2C_2 + C_1)Q}{2} \quad (10)$$

容易看出,配额 $Q$ 能够同时影响中美两国大豆生产者的生产决策,进而对两国大豆生产者的利润水平产生影响。

接下来考虑中美两国的政府决策。假设两国政府均致力于实现本国福利最大化,在这里,一国的福利水平是该国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利润水平的加总。假设 $S_1$ 和 $S_2$ 分别代表中美两国的消费者剩余,则中美两国政府的福利表达式分别为

$$W_1 = \pi_1 + S_1 \quad (11)$$

$$W_2 = \pi_2 + S_2 \quad (12)$$

对中美两国消费者而言,给定本国消费市场的大豆供应量,两国消费者剩余可分别表示为

$$S_1 = \frac{b(Q_1 + Q)^2}{2} \quad (13)$$

$$S_2 = \frac{b'(Q_2 - Q)^2}{2} \quad (14)$$

将(5)式和(13)式代入(11)式,得

$$W_1 = \frac{(A_1 - C_1 - bQ)^2}{4b} + \frac{b(Q_1 + Q)^2}{2} \quad (15)$$

$$W_2 = (P_2 - C_2)(Q_2 - Q) + (P_1 - C_2)Q + \frac{b'(Q_2 - Q)^2}{2} \quad (16)$$

政府可以通过调整配额实现本国福利的最大化,但是中美两国政府所认为的最优配额数(分别表示为 $Q_C^*$ 和 $Q_A^*$ )是不一致的。为了验证这一点,将(6)式和(8)式代入(15)、(16)式,然后将两国福利表达式对配额 $Q$ 求导,得到

$$\frac{\partial W_1}{\partial Q} = 0 \rightarrow Q_C^* = \frac{A_1 - C_1}{b} \quad (17)$$

$$\frac{\partial W_2}{\partial Q} = 0 \rightarrow Q_A^* = \frac{A_1 - 2C_2 + C_1}{2b - b'} \quad (18)$$

根据前假设, $C_1 \leq A_1$ 且 $C_2 < C_1$ ,而且由于大豆的粮食及经济作物属性,其需求之价格弹性较弱,加之中美两国对大豆的使用途径相似,故而 $b'$ 可以约等于 $b$ ,从而得 $Q_C^* < Q_A^*$ 。

该分析表明,中国政府所认为的最优配额数要小于美国政府所认为的最优配额数,这是因为较少的配额有利于削弱美国大豆对中国大豆生产者的冲击;相反,即便是面对中方采取的配额等反制措施,美国政府仍然认为配额数应该更大,以保证本国大豆生产者仍然能从中国市场获得利润。而双方在配额上的分歧,本质上是由两国大豆生产成本的差异决定的。由于美国大豆单位生产成本低于中国这一现实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两国在配额上的分歧很难化解。美国甚至有可能因此采取新一轮反制,继续恶化国际贸易形势。

中美两国的国情与国际形势造成两国谈判者的“获胜集合”大小存在差别。美国独特的“三权分立”国内政治制度架构对其“获胜集合”施加了更加严格的约束,而当前美国国内不同政治派别间的对立进一步限制了美国谈判者的“获胜集合”大小,或者增加了美国在对华谈判中的议价能力与灵活性,但也大大缩小了成功达成协议的空间。在中美的贸易政策谈判中,美国做出“非自愿背叛”的概率更大,这也是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出尔反尔、多次毁约的原因。

在比较优势理论下,中美通过大豆贸易都可以获益。然而,获益的大小在不同的贸易条件下是不同的。两国间贸易条件由它们协商共同决定,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程度和经济实力不同,因而在贸易中获得收益的大小也存在差别。因此,双方会围绕着由于贸易条件不同而带来的相对收益的区别而发生摩擦甚至冲突,进而采取非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



来维护本国利益。战略性贸易政策等都强调了国家利益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是两国在贸易冲突中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和理论基础。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专家们认为,当代的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多数企业面临的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手段来影响或改变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进而培育本国产品生产和出口的比较优势。

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违背其做出的削减农业补贴的承诺,对本国粮食生产给予高额补贴,从而提高美国大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从1995~2002年,美国政府共提供了114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粮食产业利润的1/3来自政府补贴。相关数据表明,美国出售到世界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均低于成本价格,而且在1996年新一轮粮食补贴政策后,比重大幅度上升。

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国内大豆的供不足需和对国际大豆的巨额需求,以及美国掌握国际大豆的定价权,所以中国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只能选择跟从美国,作美国大豆的进口国,即使大豆价格上涨,中国也只能接受这个价格,继续进口,让美国攫取高额利润。

## 二、中美大豆贸易美国国内层面的博弈分析

### (一)参与国内层次博弈的主体

一国的贸易政策除了受到国际环境和各国间相互博弈的影响,还受到国内各种因素影响。因此制定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国际因素,也要考虑到国内的需要和可能。由于美国特殊的政治结构,它的贸易政策比其它国家更多地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决定和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主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国家权力机关,包括国会、总统及内阁部门和联邦法院;第二类是从事大豆贸易的跨国公司;第三类是从事大豆种植的农民。在此,我们暂不考虑农民和跨国粮商之间的博弈关系,仅将农民看作农产品的供给者,将跨国粮商看作农产品的销售者。

在美国贸易政策分析中,利益集团模式是一种

最为主流的方式,特别是被用于分析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时。利益集团模式的一个重要假定是,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是政治选票与经济利益的交换,换言之,是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

在美国各类经营活动中,政治因素的影响无处不在,利益集团如何在决策中发挥作用,托马斯·戴伊提出“精英主义”,他认为,美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水平形式的,而是垂直或者说等级形式的。能够影响美国政策制定的仅仅是人口中的极少数,具体来说是几大寡头垄断集团而不是多元的利益集团。美国利益集团的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能够参与到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参与决策的利益团体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拥有巨大的海外利益,该国的贸易政策对其造成巨大影响;二是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它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三是必须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有自己的代理人。而跨国粮商就是这样的利益集团。

### (二)不同利益主体与美国政府的博弈

1. 美国政府与跨国粮商间的博弈。美国粮食行业的垄断程度非常高,跨国粮商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跨国粮商是指美国的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的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ABCD”,目前的国际大豆贸易可以说由它们所控制。一方面,跨国粮商掌控着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大豆生产国的货源,另一方面,通过收购兼并大豆加工企业,控制着大豆的加工,全方位垄断着大豆贸易。

美国政府和利益集团在制定政策时相互博弈、相互影响、相互妥协;在政策具体执行时,又会相互合作、相互配合、寻求“共赢”。美国政府所推行的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跨国粮商经济利益的,并且得到了这些利益集团的支持。美国政府对大豆贸易的高额补贴,使得美国大豆可以以较低价格在中国销售。美国政府制定的补贴大豆等农产品的政策是双赢的合作博弈结果,既契合了美国政府希望在经济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又符合了跨国粮商谋取高额利益的动机。此外,跨国粮商在全球的扩张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支持,毕竟世贸谈判的主体

是政府。

而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的扩张也需要充分发挥跨国粮商的作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不断的兼并或强强联合,美国少数的几个粮食集团得以形成。它们控制着全球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体系,决定着世界市场上的粮食种类和粮食价格,在全球提供粮食的同时也扩大着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时,跨国粮商在全球聚敛的巨额财富通过政治献金等形式转移到政府手中,为美国在全球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财力支持。

但美国政府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而非局部的利益得失。甚至有时候会因为政治、军事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而牺牲一部分经济利益,目的是顾全大局。例如,大豆并不是美国主要的赚钱工具,对美国政府而言,中美大豆贸易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而美国利益集团的目标则是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美国政府和利益集团这二者的目标和立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制定政策时双方冲突在所难免。

从与中国的关系看,跨国粮商提供了我国80%~90%的进口大豆,并通过收购国内压榨厂等方式,控制原料采购权,进而抢占中国大豆市场定价权。可以说,中国市场成为了跨国粮商举足轻重的利润来源,而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无疑直接损害了跨国粮商的利益。

当美国政府的政策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跨国粮商就会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庞大资源去影响美国政府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在非合作竞争中保证自身最大的利益。美国的粮食利益集团在决策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跨国粮商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巨额财富,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和国会立法,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的颁布和执行。管制理论的鼻祖斯蒂格勒在1971年提出捕获理论,即在社会中,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社会公平,但政府和政治家也是一个有自身利益的理性人,管制者很容易被其权力租金诱惑,被管制者“捕获”,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制定

政策的过程中为利益集团牟利。尽管美国的粮商巨头拥有强大的财力和影响力,但在国内与美国政府的非合作博弈中必然还是处于被动地位,为了在博弈中保证自己的利益,跨国粮商会选择用租金来控制个别政策制定者,让其为自己发声,促使对自身有利的政策推行和实施。与此同时,实施管制能够产生租金,并且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竞争的对象,而管制者可以决定管制所服务的特定利益集团,使得管制实质上成为政治家获取租金的工具。因此,在考虑到经济利益后,决策者会根据租金的多少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服务的利益集团。这是跨国粮商与美国政府博弈的大环境下的跨国粮商与政治决策者之间的博弈,是二者的互相选择;两种博弈共同决定了美国政策的制定。

其次,利益集团还通过游说政府,使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成为他们的公司派出人员,来影响国家贸易政策的制定。例如,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与跨国粮商之一嘉吉公司的执行总裁的推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该执行总裁代表公司利益,但他同时也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美国农业首席谈判代表,因而他大力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并使其成为现实。通过这种方式,跨国粮商使政府的政策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在大豆贸易中,跨国粮商攫取了大部分利润。

美国政府与跨国粮商的合作与博弈控制和垄断了全球大豆贸易,剥夺了中国的话语权,因此,我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却不能够拥有与之相匹配的定价权。此外,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与其它社会团体合作,给美国国会施加影响等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

2. 美国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博弈。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宏观角度制定的贸易政策很可能损害到国内人民的利益,因此,双方在国内一定会进行一次或多次博弈,双方妥协来得到一个可行的最佳的结果。

中美的对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美国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中国对产自美国的大豆增收了25%的关税之后。面对大豆买家的流失,美国国内的农民开始发出反对的声音,而美国政府在考虑了各方因素之后,也做出了政策上的改变。例如,2018年7月25日,白宫发表的声明指出,为回应别国对美国农

产品征收的不合理关税,特朗普总统正在为美国农民提供所需的救济。总统授权美国农业部根据《商品信贷公司宪章》向农业核心地带提供高达120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包括“营销促进计划”、“食品购买和分配计划”、“市场促进计划”,白宫方面还称,向美国农民提供的援助将缓解不公平贸易带来的冲击,直到美国与贸易伙伴达成公平和互惠的贸易为止。2019年5月23日,特朗普又授权农业部提供高达160亿美元的贸易缓解计划,以支持本国农民。

对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模型来解释。其中,由于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观点居多,所以在此主要讨论农民提出反对意见后,美国政策的变化。



图2 美国国内在大豆贸易问题上的博弈

近年来,美国农产品的销路受阻、农民反抗声越发强烈。美国农业部的谷物库存报告显示,美国大豆库存在2018年12月创历史新高,达到37.36亿蒲式耳。库存增加是供应过剩和需求减少的指标,并常常预示着价格下跌。为此,美国增加了对农业的补贴,可补贴毕竟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并不能完全弥补已有的问题。大豆滞销、一些农民前一年种植更多大豆的滞后性显现、买家流失等等,也让农民认为这些巨额补贴是“无用功”。面对农民的反对,美国政府有两种选择:改变强硬的贸易策略,或者不改变现有的政策。这两种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博弈结果。

如果美国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改变现行的政策,

缓和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挽回中国这个大豆进口商,那么美国的农业和农产品贸易将会逐步得到恢复,农民也会恢复收益;美国也能将国内的经济运行拖回正轨,有利于国内的发展。但一个很重要的、可能会阻拦美国作出这一决定的因素就是,美国需要向中国表示屈服,在外交上表现出了妥协,这种带有一定程度示弱的决定与美国的称霸目标相悖。如此考虑,美国也有理由出于政治因素而坚持对华贸易的强硬措施。

不过,如果美国选择继续采取强硬的态度,虽然没有政治外交方面的软弱表现,但国内的压力不会得到缓解,甚至会进一步加重。大豆等农产品的销售会受到冲击,农民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农业受其波及,美国国内的经济也会因此承受压力。从理论上讲,美国选择改变强硬战略是可以让国内博弈的双方得到更好结果的。

### 三、对美国对华大豆贸易的再思考

中美之间围绕大豆等农产品发生的贸易摩擦,实质上反映了单极体系下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与作为崛起国的中国的战略互动。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秩序的稳定依赖霸权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这表明,单极体系是霸权国依照自己的偏好建立起来的,因而霸权国也是体系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这种利益不仅体现在经济、军事等物质层面,更加体现在国际影响力、国际威望等心理层面。而当体系中出现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时,霸权国的利益空间将受到挤压。一方面,崛起国将侵占霸权国的市场,在物质层面对霸权国形成冲击和挑战;另一方面,崛起国物质实力的不断增强也将伴随着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威望的提升,从而削弱霸权国的国际地位。当面临此种情况时,霸权国必将采取相应的战略进行霸权护持,而崛起国也将采取对应的措施进行反制。

当前,中国正处于崛起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中国的外交战略逐渐由“韬光养晦”转为“奋发有为”,向外发展的势头不断高涨;经济上,中国成为了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甚至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也保持着顺差优势,这严重挤占了美国的全球市场;在国际影响力上,中国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



大,承担的国际义务也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承认中国的崛起,这反过来也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威望。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压制态势也趋于加剧,相继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甚至直接将中国界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因此,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战略互动关系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在与美国围绕大豆贸易展开的博弈中,中国所面临的不利情况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由于中国“获胜集合”较高而带来的谈判灵活度低之不利因素,其二则是由于当前仍不够公平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体系以及中国对美国大豆的不平衡依赖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因素。因此,需要采取切实之措施以应对之。

就大豆贸易问题而言,中国可以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政策护航:大力实施“大豆振兴计划”

美国在大豆贸易上拥有比中国更强的比较优势,是使得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依赖高于对中国农产品的依赖的关键原因。为此,要大力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将提高优质大豆产量和质量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其一,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稳步提高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加大大豆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规模效益;其二,加大补贴力度,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提供资金支持,以此提升我国大豆相关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 (二)金融护航:运用金融市场保障我国农业利益

美国一向注重借助金融工具实施农业支持政策,达到维护本国农业生产者利益的目的。在大豆生产方面,美国推出营销援助贷款、价格损失保障计划、农业风险保障计划等政策工具,通过调整作物贷款率、价格损失保障支付率、风险保障价格等方式,满足大豆生产者在粮价低迷等不利条件下的资金需求,确保大豆生产者收入稳定。诸多研究表明,以“ABCD”(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为代表的国际粮食巨头非常重视粮食业务与金融市场的结合,并将期货等金融工具作为其扩张海外业务、争夺国际粮食定价权的重要途径。为此,必须积极运

用金融市场,提高我国粮食定价和议价能力,进而维护我国农业安全和发展利益。一方面,要进一步重视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作用,积极挖掘各类金融衍生品潜力,加快完善我国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等平台的交易规则,面向国内和国际投资者推出更多大豆类期货产品;另一方面,我国大豆种植、流通企业要特别注重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健全应对贸易争端与摩擦的风险防控预警机制,提高抵御国际经营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 (三)科技护航:增强农业科技创新实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美国在农业科技领域占有较大优势。为了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我们必须对农业科技予以高度重视,加大该领域的投入力度。其一,要提升农业科研水平,通过发展育种、耕种等技术,提高本土大豆品种出油率等关键指标;其二,要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深化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类高校与大豆种植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生产主体的产学研合作。

### (四)新贸易业态护航: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

人多地少是我国大豆生产必须考虑的基本国情。在积极发展国内大豆产业的同时,我国粮食企业还应加强与外国的农业合作,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具体来看,我国粮食企业应积极借助“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国际合作平台,与主要大豆出口国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例如,长期以来,巴西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生产国,在中美贸易下,巴西成为全球领先的大豆生产国和世界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并且在2018-2019年度,巴西的大豆产量超过了美国。自2015-2016年度以来,巴西大豆产量增长了22%以上。几乎所有增加的产量都进入了出口市场,出口市场同期增长了34%,特别是中国市场。探索通过订单农业等形式,在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国家发展大豆种植,建立和巩固我国大豆农产品海外供应基地;抓住我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与跨国农业企业的合作,积极借鉴其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我国农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从政策层面看,对于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的国内粮食企业,我国可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政策工具,为这些企业提供融资、税收、法律等方面支持。

### (五)全产业链护航:提高大豆行业发展竞争力

从国际趋势来看,农业全产业链经营是国际粮

食巨头的重要特点,也是其国际粮食定价权的重要支撑。我国只有形成一批具有全产业链经营能力和全球化产业布局的优质企业,才能改变当前粮食定价权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为此,要积极鼓励一批资金实力雄厚、国际化经验丰富的国有大豆企业率先进行全产业链布局,实现对大豆育种、种植、加工、流通等流程的“全覆盖”;通过鼓励大型粮食集团设立或收购农业专业技术公司、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农业相关业务等方式,优化农机、化肥等产品和服务供给,着力降低大豆种植主体的生产成本,并且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对积极布局大豆全产业链的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信贷支持。

随着全球农产品经贸合作力度日益加深,主要贸易国家之间以及重要农产品贸易领域内相关的摩擦会相应增多。全球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常态化将是除气候和灾害等自然因素外影响未来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重要来源。目前来看,在贸易政策和经贸合作大环境影响下,大豆贸易格局呈现明显变化,一是当前贸易政策环境背景,美国国内大豆库存高企、出口需求弱勢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显著改善,全球大豆市场供需格局仍将延续供给总体宽松。二是全球大豆贸易格局的变化日益清晰,中国与巴西的大豆贸易将会增加,但美国也会寻找和开拓新的市场。

在全球大豆供需形势和价格走势新动向背景下,中国大豆乃至油料油脂市场平稳运行需要关注供给安全和市场风险。为此,一是适度增加油料油脂进口规模,确保国内食用植物油供给稳定。短期内可增加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大豆进口规模,补充国内大豆供给缺口,防止大豆油价格过快集中且大幅上涨;适度增加棕榈油、菜籽油等其它油脂进口量,确保国内食用植物油市场供给总体稳定,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二是深入推进大豆产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切实提升大豆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支持大豆保护区建设,推广大豆生产节本增效模式,稳步提升国产大豆产能和生产效益;支持和鼓励国产大豆加工企业设备升级改造,提升国产大豆油品质和竞争力;积极拓展大豆产业多功能,深入挖掘大豆产业综合效益;三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优化大豆进口产品和来源国结构。受耕地、水资源和环境约束,国内大豆面积增加的空间有限,在国内大豆消费需求总量增加、结构升级趋势下,仍需要通过国际市场调剂余缺。未来中国应该在进口品种以及来源国多元化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 参考文献:

- [1]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J]. World Politics,1978(2):167- 214.
- [2]佟家栋,高乐咏.国际经济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29.
- [3]Thomas R.Dye.Who's Running America:The Bush Years [M].N.J.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90: 23-26.
- [4]姚林.中美贸易摩擦下的中国大豆产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J].中国油脂,2020(2):10-14.
- [5]肖志敏,杨军.中美大豆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及其启示——基于GTAP模型测算[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9(3): 70-78.
- [6]侯荣娜,戴旭宏.中美贸易战视角下振兴东北地区大豆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J].农村经济,2019(12):26-32.
- [7]张莹,丁梓欣,黄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进口南美大豆的替代影响[J].拉丁美洲研究,2019(6):95-117.
- [8]崔戈,焦玉平.国家粮食安全视角下的中国大豆贸易[J].社会科学,2019(2):13-28.
- [9]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8(3):433-435.